

#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三百年

(下篇)

——中国文化与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译介

李明滨

翻译和研究古典作品是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项主要工作,这可以分几方面来叙述。

## 1 诸子百家的译介

早在 18 世纪初,俄国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就开始接触《论语》,有的团员还翻译了《四书解》。18 世纪末叶出版《大学》(1780)、《中庸》(1784)和《孟子》(1804)的俄译本。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喀山大学任教时最早将《论语》引起大学课堂,写出主要论著《东方的宗教:儒、释、道》。三百年来俄国对儒学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热潮到低潮再到热潮的过程。

18 世纪出现了热潮,其标志是有好几位汉学家译介《论语》,喀山大学讲授“四书”。最有名的汉学家比丘林把儒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读书人信奉的宗教,并特为此写出一本评介性的书《书生的宗教简述》(后于 1906 年出版)。到了 19 世纪这股热潮已扩大到对诸子百家的兴趣。进入苏联时期儒学由于被当作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而遭到冷遇,连一般的古代文化典籍也被视为落后或迷信的东西,因而降入低潮。本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

的讲话,《世界汉语教学》1996 年第 3 期。

⑤ 赵金铭, 1996

### 主要参考文献

桂诗春 1988《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黎天睦 1987《现代外语教学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吕必松 1990《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华语教学讲习》,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国家教委对外

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麦基 1990《语言教学分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皮特·科德 1983《应用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盛炎 1990《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

施光亨 1994a《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的学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b《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若干议论和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增刊

王苏 1992《认知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明初 1990《应用心理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

王振坤 1994《浅谈汉语言文化教学的理论依据及其学科体系》,《汉语言文化研究》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许嘉璐 1996《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袁博平 1995《第二语言习得的回顾与展望》,《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赵金铭 1996《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中国语文》第 6 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加上东方“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纷纷宣告其部分原因在于奉行了儒学,俄国便也跟随国际的儒学热潮之后,掀起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热,陆续出版了几种译本和专著。有西门诺科著《孔子的箴言》(1987),马良文著《孔子》(1990),佩列洛莫夫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和译作《商君书》(1991),再版和新校译《易经》(休茨基译,1990和1992)等。还有一大批论文,以及召开儒学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莫斯科,1993)诸子百家的翻译也由点扩及到面。已出单行本的有施泰因译《管子》(1959)休茨基译《易经》(1960)康拉德译《孙子兵法》(1950),克·瓦西里耶夫译《战国策》(1968)等。

至于选摘片段翻译的则已涉及所有“诸子”了,有《春秋》《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孟子》《列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译者为波兹涅耶娃等,1963),其他如《淮南子》《盐铁论》的摘译(1950),还有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的《史记》全本(1972-1975)。

## 2 托尔斯泰深受孔老学说的影响

中国文化引起俄国作家的深切关注,其中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对它作过深刻的研究。

1891年11月,彼得堡一位出版家写信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在1884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不但如此,他还写过《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在前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可见,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

从托尔斯泰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中还可以看出他也读过孟子、墨子等人的著述,从1884到1910年将近20年中托翁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或论文。在其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中,曾引用了大量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足见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的深广程度。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曾亲自动手翻译了老子的言论,此事已传为文坛佳话。他从1884年起就动手摘选和翻译《道德经》,主要从法译本并参照德译本转译。他边读边译边研究,断断续续经过10年完成。译作于1910年由“媒介”出版社印行,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为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后来,托翁去世后,1913年又出版一个经别人整理的译本,书名是:《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综观当年的历史资料,许多汉学家的译稿都未及发表,仅仅作为手稿保存下来,因而可以说《道德经》在俄国的流传,早期主要得力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

从托翁本身来看,他主张“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博爱”;同他推崇孔老学说中的“仁”、“省身”、“道”和“无为”等思想恰好同时进行,或者完全一致。这自然可以说作家已经深深地接受了中国圣贤的影响。

进一步说,此点从托翁的言论也已得到印证。他在《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文里就提

到：“‘道’的获得要通过节制一切个人的、肉体的东西”，“老子学说与基督学说，其实质是相同的，二者的实质在于通过节制一切肉体的东西而显示构成人的生活之基础的灵和神的本质”。显然，他已经赞同老子学说，主张道德修养中必须节制和克服肉体的、物质的贪欲，以攀登灵的、精神的崇高境界。

在 1904年由布朗热整理托尔斯泰编辑的文稿出版了《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一书，其中《列夫·托尔斯泰阐释的孔子学说》一文是据托翁的文章写成的。它写道：“中国学说的核心是这样的：真正的学说教育人具有崇高的善，这种善改造人，使人臻于至善。”以下他列出七点来具体解释如何达到那种境地：“为了具备这种善，就需要①全民族尽善。而为了全民族尽善，就需要②整个家庭尽善。要使整个家庭尽善，就需要③本身尽善。为了本身尽善，就要④心灵纯洁、返真。而为了心纯、返真，就要⑤有真诚和自觉的思想。要达到这种思想的自觉性，就要⑥有高深的知识。要有高深的知识，就要⑦研究自我。”

然而对这七点，我们都能在《大学》中找到对应的概念：①治国平天下——②齐家——③修身——④正心——⑤诚意——⑥致知——⑦格物。足见托翁的思想正是对《大学》的接受和阐释。因为我们查出，托翁曾从理雅各所译英文本《中国经典》转译了孔子的《大学》，而且写了《论〈大学〉》一文的。

### 3 译介中国文学

俄罗斯介绍中国文学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先作出宏观的总体评介，然后逐步进入具体作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因而能做到点面结合，既有全貌，又有代表作品，布局合理，自然地成为汉学大国。出身于俄国汉学基地喀山大学的瓦西里耶夫来华留学 10年后，回去先后担任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长达 50年。其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于欧洲首次从 1850年起在高校中开设系统的中国文学课程，而且于 1880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书（包括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书仅在本世纪初才出现）它系统扼要地勾画出从古代至清代文学的历史概貌，并且有分类有重点地叙写。作者认为：“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是儒学。”因而辟出很大的篇幅对儒、释、道学作出评介，不仅详介诸子百家，而且涉及佛教经籍。书中重点之一是分类评述诗文、戏曲和小说，除了综述，还举例分析作品，有的附上故事梗概，有的援引原作，而且不时地做出精辟的论断。关于诗文，从《诗经》到清诗，一以贯之；文也不少，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格律诗、赋（《两都赋》《三都赋》等）到“诗体小说”弹词，以及“小型百科全书”《三字经》等。他概括中国诗坛的盛况说：“倘若我们知道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佐夫的一些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他们写的那种短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只需例举司马相如、杜甫、李白、苏东坡等”就够了。

瓦西里耶夫盛赞中国戏曲作品浩如烟海，重点分析了《西厢记》，说：“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他进一步指出：“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显露出中国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

接着他分种类论述了中国小说：中篇小说《列侠传》《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章回小说《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直到《品花宝鉴》《好逑传》等，历史演义

《开辟演义》《列国》《战国》《三国志》等。对《红楼梦》尤其作为重点

瓦西里耶夫为后代汉学家开了好头,作了有益的引导,使俄苏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有了全面进展

1 诗词 从《诗经》到清诗以及五四以后的现代诗都有译介。重点是唐诗、宋词和现代(革命)诗。费德林受郭沫若的指导编出《中国诗集》四卷(1957),囊括了历代名诗,流传最广。为翻译这么浩大的诗歌选集而造就了一批汉诗翻译和研究家。费德林自己就专门研究了《诗经》和屈原,都写成了专著。汉诗最早的俄译本是1874年在彼得堡问世的王勃《滕王阁序》(10页)。

费编唐诗卷收入唐代61位诗人的20首诗,均为有代表性的名诗。此外,出过几位唐代大诗人的专集俄译本:吉托维奇译《李白抒情诗选》两种(1956-1957),吉托维奇译《杜甫诗集》两种和《杜甫抒情诗集》一种(1955-1962-1967),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各译一种《王维诗集》(1959-1979),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三百首)(1960),《白居易诗集》最多,共出六种(1946-1949-1951-1958-1978-1965),均为艾德林译。而且这几位诗人均有人写出研究性专著。计:费什曼著《李白的生平和创作》(1958),谢列布里亚科夫著《杜甫评传》(1958)和别仁著《杜甫传》(1987),达革达丹诺夫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1984),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著《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1916)。

宋词影响较大的选本是乌斯曼诺夫译《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入选词人19位,其中宋代词人占10位。此外,乌斯曼诺夫还译出《辛弃疾诗词集》(1959-1961各一种)和李清照《漱玉词》(1970和1974各一种),戈鲁别夫译出《苏东坡诗词集》(1975)。至于宋诗,有克立夫佐夫编选的俄译本《宋诗》(1959)收入宋代诗人作品最多,共40位诗人的181首诗。个人专集则有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1960)。研究宋代诗词的唯一专著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著《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1979)。

2 戏曲 以元曲为突出。早在1829年,《雅典娜神庙》杂志就发表短文《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关汉卿的《窦娥冤》剧情。还写到另一种元杂剧《元夜留鞋记》的故事。1839年《读书丛刊》译载元剧名为:《樊素,或善骗的使女》,经核对,此即郑光祖的《梅香翰林风月》。1847年彼得堡出版了由法文转译的高则诚《琵琶记》单行本。

较有影响的是彼得罗夫编选的《元曲》俄译本(1966)和孟列夫译《西厢记》(1960)。前者收入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好古的《张生煮海》,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张国宾的《合汗衫》,郑光祖的《倩女离魂》11个剧。论元杂剧的唯一专著是索罗金写的《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1979)。

此外明清名剧《长生殿》《桃花扇》和《牡丹亭》也有了俄译(片断,1976)。

3 章回小说 俄译本最多。早在1832年就在莫斯科出版由法文转译的俄译本《好逑传》。在本世纪中叶始又大量翻译出版。计有:1954年帕纳秀克译《三国演义》两卷本,1955年罗高寿译《水浒传》两卷本,1958年帕纳秀克译《红楼梦》两卷本,谢曼诺夫译《老残游记》,1959年罗高寿和科洛科洛夫合译《西游记》四卷本,华克生译《儒林外史》,费什曼、蒙泽勒、齐别罗维奇合译《镜花缘》,1960年谢曼诺夫译《孽海花》,1963年帕纳秀克译《三侠五义》,1977年马努辛译《金瓶梅》,1983年帕纳秀克译《平妖传》。

其中几部名著还出过缩写本:《三国演义》(1984)、《西游记》(1982)、《水浒传》(1968)。论章回小说的著作迄今已出版三部:李福清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1970),谢曼诺夫著《中国章回小说的流变》(1970)和费什曼著《中国的讽刺章回小说》(1966)

4 现代文学是俄苏译介的一个重点。迄今翻译出版(多数为集体分工翻译的)主要的有《鲁迅选集》四卷本(1954-1956)、《郭沫若文选》两卷本(1958)、《茅盾文集》三卷本(1956)、《老舍两卷集》(1957)、《瞿秋白文集》两卷本(1959-1975)、《艾青诗选》(1981)以及切尔卡斯基编选并译的从“五四”至80年代的现代诗选先后出五本(1964-1969-1975-1978-1987)。其他单行本的译本数量众多,如有《吕梁英雄传》(1951)、《暴风骤雨》(1956)、《三千里江山》(1956)、《把一切献给党》(1956)、《青春之歌》(1959)、《李有才板话》(1974)、《围城》(1980)以及当代小说《人到中年》(1985)、《芙蓉镇》(1986)、《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1986)等。

研究现代文学的专著也成批出现,重要的有四本鲁研专著——索罗金著《鲁迅世界的形成》(1958)、波兹涅耶娃著《鲁迅·生平与创作》(1959)、彼得罗夫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1960)、谢曼诺夫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两本评老舍专著——安季波夫斯基著《老舍早期创作》(1967)、博洛京娜著《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83)。还有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1954)、苏霍鲁科夫著《闻一多生平与创作》(1968)、阿日马穆多娃著《郁达夫与“创造社”》(1971)、索罗金著《茅盾的创作道路》(1962)、施奈德著《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964)、尼科里斯卡娅著《曹禺创作概论》(1984)和《巴金创作概论》(1964),以及马尔科娃著《郭沫若的诗歌创作》(1961)等等。

总的看来,其译介和研究均注重作家作为革命者和革命内容的作品,因而秋瑾、殷夫、朱自清等人也备受重视。

当然,整个汉学研究的重点仍是传统文化,汉学家们对它充满敬意。这方面资深汉学家费德林通讯院士的言论具有代表性:“我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优秀著作是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三百年来,中国文化传入俄罗斯的,不仅范围广,而且种类多。文化典籍和经典著作,举凡哲学、宗教、法律、历史、民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等中国论著的俄译,应有尽有。珍奇古董、艺术品、文物,从高雅的宫廷摆设到通俗的民间剪纸、年画,从现代绘画雕刻到业已失传的考古珍品、稀世文物,从武术气功到中医以及养生术,都在俄罗斯人的接受、收藏和研究之列。

翻译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工作尤为突出。译介的对象从古代、近代一直延伸到现代,从大师巨匠扩展到中小作家,从书面文学扩大到口头文学,译介作品也从零星分散走向集中和系统化,大型的包罗古今名著的“中国文学系列丛书”(四十种)正在陆续问世,研究和论述的工作也在逐步配套完备。这个领域在苏联解体以前甚至存在过全国统一规划和由几个汉学中心进行调节。

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然起步比西欧稍晚,但从成果和专业人才的数量上看却是后来居上,它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